

国家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

道家与民族性格

吕锡琛 著



湖南大学出版社

道家与民族性格

吕锡琛 著



湖南大学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以深沉的笔调剖析了道家思想对中华民族思维方式、行为原则、价值取向、处世之道等各个层面的深刻影响及其正负效应;以真诚的关怀指点现代人如何拥有人生、美化人生、塑造人生。

道家与民族性格

Daojia Yu Minzu Xingge

吕锡琛 著

☐责任编辑 熊志庭 韩 虹

☐装帧设计 王 维

☐出版发行 湖南大学出版社

社址 长沙市岳麓山 邮码 410082

电话 0731-8821691 0731-8821315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装 诚成(湖南)影印有限公司

☐开本 850×1168 32开 ☐印张 9 ☐字数 218千

☐版次 1996年6月第1版 ☐1998年1月第2次印刷

☐印数 3 001-6 000册

☐书号 ISBN 7-81053-024-0/B·2

☐定价 15.80元

(湖南大学版图书凡有印装差错,请向承印厂调换)

序 一

萧蓬父

道家学脉，源远流长，其思想积淀，可溯源到远古时代。

母系氏族社会中的原始平等意识、母性崇拜意识，以及物我一体、人天同构的自然生态意识，尤其是原始社会末期公社成员中产生一部分“避世之士”所坚持的自由精神和对于阶级分化与权力异化的自发反抗意识等，都为道家思想奠定了原发性的文化基因。至于以后道家的文化积累与理论升华，由古代论道诸家的个别观点到《老子》一书的集其大成，由祖述老聃，阐扬道论，南北道家各派的系统到黄老治术思潮的形成，在汉初一度用世并取得文景之治的效益而又迅速被罢黜。经过这一番起落和发展，道家思想大体被定位为与儒学正宗相对立的“异端”，依附于隐者，流播于民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别树一帜。它不仅勇于参与历代的学术争鸣，而且广泛渗透到中华民族精神生活的各个层面，浸入无意识深层，化为民族性格。这是不争的事实。

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容忍一种流行的模糊观念，似乎儒家文化即可以代替或代表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从而把中国传统文化单一化、凝固化、儒家化。这显然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与此相关，即使承认道家文化的存在，而囿于传统偏见，也对道家思想的历史作用贬斥居多。这也显然不是历史的公论。80年

代以来,情况有了一些变化。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文化问题讨论的日益深入,文化视野的不断扩大,道家文化的研究也有了多方面的新进展。一些历史形成的文化偏见,由于研究领域的纵向和横向的扩展,研究方法与诠释角度的转换和更新而得以逐步克服。因而,近几年涌现了一批卓有新意的关于道家思想的研究论著。吕锡琛同志继《道家方士与王朝政治》一书之后,又推出了《道家与民族性格》一书,正是这批脱颖而出的优秀论著之一。

吕锡琛同志执教湘南,神游柱下,潜心研究道家思想文化多年,其《道家方士与王朝政治》一书,着重研究了道家和道教以及方士在中国古代政治舞台上的角色和巨大影响,从文化功能的角度突出了道家的政治关怀。现在新完成的《道家与民族性格》一书,则从更广阔的视野,通观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生活现实,试图揭示道家思想在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中留下的深刻烙印。这一研究的目的性非常明确,旨在披沙拣金,去伪存真,以促进民族性格的改善和更新。

吕锡琛同志的这本新著,围绕着“道家思想与民族性格的互动关系”这一主题,展开了多视角、多层面的系统论述。该著注意到小农经济与君主专制及等级结构是道家思想依存的社会基础;分析了道家思想影响民族性格的具体途径和方法;强调了道家思想既是民族性格的理性反映,又反过来多方陶冶着民族性格;并由此引出前瞻性的结论:肯定道家提出的顺应自然、兼收并蓄、抱朴守真、崇俭抑奢、柔弱不争、不与物迁等行为原则和道德要求,不仅在历史上发挥着指导人生,净化风俗、稳定社会秩序的积极作用,而且,时至今日,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改善民族性格、促进人类进化等方面,仍将发挥其特有的功能。作者这种理与史相结合、古与今相贯通的论证分析,把道家思想文化的研究引向现实、具体和深化,令人

耳目一新。

民族性格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内涵丰富，歧解很多。中华民族的性格特征，则更是一个繁难问题。由于中国是在空前的民族危机中步入近代，近代以来中西文化在激烈的冲突中进行对比，民族性格或国民性问题成为文化论争中的一个焦点，成为各种观点中分歧最大的一个论题。作者在本书中对于各种观点详加论列，慎予综合，尊重前修，而不苟同，特别是对于前人论述不多的道家思想对民族性格的渗透和影响的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独立探讨，所作出的一系列论证和结论，虽尚有某些可商酌之处，但大都持论有据，言之成理，自为经纬，成一家言。

作者在本书中力图贯彻多维发展的文化史观和矛盾两分的评价原则。书中在阐述道家思想对民族性格的影响时，往往引述儒家思想的影响作对比分析；肯定传统文化中多元并存、多维发展的格局，注意揭示儒、道两家作为两大文化主潮的互补机制和协调作用。书中在评价道家思想对民族性格的历史铸造和现实投影时，往往注意到它的正、负面作用及其复杂的二重性，力求作出具体的矛盾分析。如书中论述分析“柔弱不争之德”主要体现了人们对封建专制制度的适应和屈从，同时也发挥了调节人际关系的功能；至于道家“抱朴守真”的思想原则可以发展为对扭曲人性的封建专制主义及其虚伪道德的抨击和抗议，在其影响下生发的“童心说”、“性灵说”等则更起着振聋发聩的启蒙作用，但同时也给处在封建政治高压之下的中国人一席退避和喘息之地。这样的具体分析，较能避免形而上学直线性思维的片面性和绝对化，而力求做到论述全面，评判公允。

本书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坚持历史科学的现实性和前瞻性，清理过去是为了开拓未来。作者强调，一方面要如实探

讨在民族性格的形成过程中，道家曾产生过哪些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另一方面更要努力弘扬道家思想中的优秀传统，开掘其中蕴藏的有利于民族性格优化、有助于人类全面发展的精华，摒弃其消极因素，进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全面清理和重新整合，使之形成新的民族性格，藉以强化中华民族对外来文化的消化力与鉴别力以及拒腐抗病的免疫力，促使民族性格的优化发展，使之昂首挺胸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作者的这些论述中，跳动着强劲的时代脉搏，必然会在广大读者的心灵中激起深沉的共鸣。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多维发展的浩瀚洪流中，道家思想文化的研究急待扩大和加深。吕锡琛同志有志于此，勤读道书，扬权古今，笔耕不辍；书稿撰成后，作者曾由湘江远寄汉皋，虚怀下问，乐于切磋。今书将出版，余喜为之序。

1996年元月勿序于北海

序 二

唐明邦

在五千年漫长历史年代里，伟大的中华民族，饱经人间沧桑，屡遭危亡考验，却有如傲霜劲松，卓然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断焕发青春。中华民族永驻青春的光辉史实，雄辩地证明了悠久博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哺育的炎黄子孙，具有坚毅不拔的民族性格。当此世纪之交，世界各族人民正面临新的历史考验，对中华民族奋发进取的民族性格，正投以钦佩的目光。我炎黄子孙正当进行历史反思，总结历史经验，昂扬民族斗志，同心同德，奋勇向前，迎接新世纪的挑战。

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是在优秀传统文化的不断哺育下，在历史风浪的严峻考验中，日新月异逐渐积累而成。中华民族数千年来日益增强的凝聚力，是民族性格的集中体现，显示了传统文化的无穷魅力。通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层结构的审视，不难理解它对于中华民族性格的形成，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经过长期研究，人们日益取得共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流，乃由相反相成的儒家文化与道家文化共同构成。在漫长历史长河中，二者相互激荡、相互涵摄，终于融合为统一的民族文化传统。儒家文化以北方华夏文化为根基，其特点是倾向人文主义；道家文化以南方荆楚文化为代表，其特征在以自然主义为依归。前者重礼法，后者法自然，自成体系，各有千秋。众所周知，重礼法的儒家，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之道；在观察人类社会，解决现实矛盾，安定社会秩序等方面，有其独特理论，无愧为经邦济世的伟大法宝；然而在观察自然，研究科学，发展人的独立性格等方面，多有欠缺，逊

于道家。法自然的道家，讲顺应天道，回归自然，宣扬人天合一的自然无为之道；在玄思宇宙，揭示生命奥秘，拒斥伦理异化，发展个性自由方面，有其独特魅力，为中华民族生息繁衍提供指导原则；然而它在面对社会矛盾，处理人际关系，凝聚社会群体方面，存在较大局限，逊于儒家。正由于儒道二家文化思想，一阴一阳，一柔一刚，对立互补，影响着中华民族性格，使中华民族的性格具有多重特征。

道家思想文化绵延数千年，蕴藏着巨大精神财富，然而在较长时期，为人们所忽视。吕锡琛同志近年来倾注大量心血，潜心钻研，取得多方面研究成果。继《道家方士与王朝政治》之后，撰此新著——《道家与民族性格》，竭力阐发道家思想文化在培育中华民族性格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指出这主要表现为：道法自然、人天合一的自然主义精神；无为不争，谦和慈让的和平处世精神；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文化包容精神；返朴归真，谦虚自守的自我超越精神等，同儒家文化传统所倡导的自强进取精神，彼此融通，终于陶冶了自立自强、刚毅进取的民族性格，至今显示其勃勃生机。

吕锡琛同志在《道家与民族性格》中，不止对道家的基本精神作了多层次的剖析，尤为可贵的，是全面揭示了道家思想文化在改善民族性格方面可能发挥的多重功能：诸如以心换心的人际协调功能；宠辱不惊的自我心理调适功能；抑奢戒骄的社会警示功能；体道悟道的精神超越功能；顺道率性的和谐发展功能等。不少观点发前人之所未发，予人以深刻启迪。

《道家与民族性格》的出版，其现实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不止有利于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性格的深入认识，提高民族整体素质，增强民族凝聚力；更有利于世界人民加深对中华民族的认识，扩展中华民族精神的世界影响。是为序。

1995年12月24日于云鹤书房

目 次

序 一	萧楚父
序 二	唐明邦
前 言	(1)
绪 论	(5)
一、道家的基本思想及其社会基础	(7)
二、中华民族的性格特征	(17)
三、道家思想与民族性格的互动关系	(28)
第一章 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	(50)
一、道生万物,人天同源	(52)
二、道统万物,人天相感	(58)
三、物极必反,贵和有度	(68)
四、体道之途,静观玄览	(76)
五、天人合一思维方式评价	(80)
第二章 顺应自然的行为原则	(88)
一、顺应时势,无为而治	(88)
二、物各有宜,率性而行	(98)
三、宽容不苛,兼收并蓄	(105)
四、随遇而安,知止知足	(110)
五、顺应自然思想的现代意义	(118)
第三章 抱朴守真的价值取向	(127)

一、求真尚朴,独抒性灵	(127)
二、绝仁弃义,斥虚去诈	(139)
三、崇尚自由,反对专制	(148)
四、向往自然,寄情山水	(155)
五、抱朴守真思想的现代意义	(160)
第四章 崇俭抑奢的生活信条	(164)
一、恭行俭德,治国兴邦	(165)
二、持俭守约,安身振家	(169)
三、抑奢少费,富国裕民	(176)
四、淡泊廉俭,养德正俗	(182)
五、崇俭抑奢思想的现代意义	(187)
第五章 柔弱不争的处世之道	(194)
一、以柔克刚,谦下不争	(195)
二、顾全大局,为公而让	(202)
三、协调人我,慈让少私	(205)
四、功遂身退,退隐守节	(213)
五、退让全身,假让徇私	(219)
六、柔弱不争思想评价及其现代意义	(225)
第六章 重生养生的人生追求	(233)
一、少私寡欲,恬淡节情	(234)
二、致虚守静,见素抱朴	(241)
三、无己无待,不为物累	(248)
四、缘督为经,安时处顺	(255)
五、重生养生思想的现代意义	(259)
结语——道家思想精华改善民族性格的功能	(263)
主要参考书目	(274)
后 记	(277)

前 言

随着人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了解和研究的深入,随着现代文明弊病的暴露和蔓延,在世界范围内,道家思想的独特价值日益为人们所认识和重视。开一代风气的世界哲坛大家海德格尔等人十分重视老子思想,他甚至抨击以往的欧洲哲学,视老子哲学为源头活水;美国学者蒲克明预言,《老子》一书将成为“未来大同世界家喻户晓的一本书”;当代一些科学家如汤川秀树、卡普拉等人赞誉道家的生态智慧,重视道家哲学某些基本观点对于现代科学的启发意义;日本学者福永光司十分重视老子的“道”哲学对于现代医学、医疗的指导作用;据《梅纽因谈话录》所载,美国当代著名音乐家梅纽因将《老子》一书随身携带,视其为“最值得经常拿出来看看的著作”。海峡两岸的不少著名学者也高度评价道家文化的历史价值和现代意义。这些事实向人们昭示,道家思想对于中国人乃至整个人类的精神成长、人格完善及社会发展均有着值得珍视的独特作用,同时也激励着中华学子们更加努力地挖掘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

四年前,作者在拙作《道家方士与王朝政治》一书中曾粗略地勾勒了道家在中国古代上层政治生活中的巨大投影,阐述了道家在治国安民等方面所发挥的正负效应及其对今人的深刻启示。此后,作者又将视角从封建王朝的政治舞台移向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人伦日用、行为风习等更为广阔的领域,试图从中寻觅道家思想在民族性格中留下的深刻烙印。现在奉献在

读者面前的这本小书便是作者的探寻记录。

在探寻过程中，作者深深地认识到，道家思想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制约和影响众多的中国人，让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着它，它正如老子所崇尚的水德，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几乎在每个炎黄子孙的血管中都流淌着道家的血液。而由于道家思想是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条件下的产物，故不可避免地带有各种局限性；加之，其理论博奥艰深，其概念又十分抽象，甚至近于“模糊”，故人们对它的理解和诠释往往见仁见智，对它的发挥和运用更是各有侧重、各取所需，因而由此所产生的社会效应自然又是十分复杂的。

如何对待道家这一历史文化遗产？它给民族性格造就了什么样的特性？在中华民族向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中，它有哪些正面和负面的价值？历史前进的主体是人，社会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中国的进步与中华民族素质的提高是密不可分的。在致力于民族性格的改善与更新的过程中，我们一方面应该充分认识和发挥道家文化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又不能在道家文化兴起的热潮中盲目自大，忽略道家思想给民族性格所带来的各种消极影响。因此，披沙拣金，去伪存真，以促进民族性格的更新和完善，这是当代中国人在文化领域内所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要实现民族性格的改善，首先应在一些基本的概念上取得共识。由于特定的历史环境所决定，“五四”时期的文化先驱者们在反省传统文化时，是以民族性的弱点来界定国民性这一概念的内涵的，将国民性等同于民族的劣根性。这一看法至今仍然在较大的程度上影响着学术界。例如，有人认为：“民族精神和国民性是一个民族精神风貌的两极，一极是基本的、积极向上的、激励人心的；一极则是非基本的、消极的、有害国民的。”（戴桂斌：《民族精神片论》，载《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1992

年第2期)我们赞赏作者对民族精神的界定,但不同意对国民性的理解。我们认为,国民性应该是民族性格这一概念的另一表述,二者皆相当于英语中的 **National character** 一词。民族的劣根性只是国民性即民族性格中消极落后的方面,而国民性中更有着积极向上的方面。改善民族性格只是要摒弃国民性中的落后因素,决不是要全盘否定国民性。将国民性与民族的劣根性混为一谈,难免造成逻辑上的混乱,而且在客观上还可能为民族虚无主义或全盘西化论者提供口实,不利于改善民族性格这一任务的顺利进行。

民族性格主要是民族传统文化积淀的结果。故上述民族性格中的二重性,是由中国传统文化的二重性所决定的。民族性格中的积极向上的方面是民族性格的承担主体对传统文化精华进行继承发展的结果,而民族的劣根性主要来自传统文化中消极落后因素的影响。总的看来,在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中,优点是占优势的,民族性格中的优秀成份在民族生存过程中不断整合,升华为民族精神,在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发挥着激励和凝聚民族成员的作用,支撑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大厦,是中华民族进一步兴旺发达的精神支柱。

因此,改善民族性格,一方面是要发扬民族性格中基本的、积极向上的、激励人心的因素,也就是说,要弘扬民族精神;另一方面,则是要改造民族的劣根性。这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但又是不能等量齐观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二者的侧重点是不相同的。本世纪20、30年代,在中华民族积贫积弱的历史条件下,鲁迅等人论改造国民性主要侧重于国民的劣根性,他的论述虽有偏颇之处,但这主要是由当时的历史任务所决定的。考察中国落后的根源是那个时代的当务之急,从民族自身的素质来寻找落后的原因,表现了自省以图强的精神。而在世纪之交的今天,我们所面临的则是不同的局面:一方面,由

于西方现代社会的弊病日趋暴露,面对现代化所产生的问题,中国传统文化在不少发达国家日趋受到有识之士的重视,展现出东西方文化融会互补的发展前景;另一方面,由于十年动乱等造成了文化断层,致使中华传统美德在民族成员身上出现了淡化或消退;加之,改革开放以来,形形色色的西方文化进入中国,既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增添了活力,提供了启示,但一些精神糟粕也对中国社会产生着恶劣的影响,腐蚀着当代中国人的灵魂。笔者认为,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改善民族性格的工作,既不能忽略民族的劣根性,更要弘扬民族的优秀传统,后者应该是更为重要的任务。

出于上述认识,作者给本书规定了两个方面的任务:第一是探讨在民族性格的形成过程中,道家曾产生过哪些积极或消极的影响?第二则要努力弘扬道家思想中的优秀传统,开掘其中蕴含的有益于民族性格的优化、有助于人类完善和发展的精华,并摒弃其中的消极因素。要完成后一个任务,就不能仅仅将视野局限于对大多数民族成员最频的、永续的人格特性的研究,而是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民族成员中的先进典型进行剖析,审视和捕捉道家思想的精华在他们身上所激起的闪光,树立标杆,推而广之,化先进人格为普遍人格,促进道家思想之精华对大多数民族成员的影响,在优化民族性格的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还要对历史上某些反面人物或消极现象进行评判,考察道家思想的糟粕或遭到歪曲变形的道家思想所产生的负面效应,从而以此为鉴,纠正和预防道家思想给人们带来的消极影响。这是改善民族性格所必须完成的基础性工作之一。当然,要完成这一预定任务,单凭作者的绵薄之力是难以胜任的,我期待着更多方家同仁的共同努力。

绪 论

在中国历史上，道家是儒家的主要对立面，又是儒家的重要补充者，正如方克立先生所说，儒道两家构成了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主干。儒家学说具有阳刚的特征，表现出自强不息、积极有为、锐意进取和入世的人生态度，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天下为己任，向往着建功立业，强调以封建伦理道德教化人民，力图维护君臣父子的封建等级制度。道家学说具有阴柔的特征，表现出顺应自然、超然物外、守朴尚俭、重生贵生、以退为进、以柔克刚和出世的人生态度，向往山林田园，视显赫的“帝王之功”为“圣人之余事”，寻求自然无为的治民之道和因性而教的化民之方，强调统治者以身作则，行不言之教。

儒家努力进取自强，以图建功立业，这种勇往直前的精神对民族性格的塑造起着积极的作用。但是，漫长的人生道路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而是充满着曲折和坎坷的。特别是在封建专制制度下，个人境遇的通达与否往往有着十分复杂的原因。当怀才不遇，壮志难酬，建功立业的志向受阻时，当个体或家族的各种不幸或灾难来临时，人们需要寻求心灵的慰藉和精神的寄托，以便从沮丧、消沉、痛苦等消极情绪中解脱出来，重新调整人生的航程。而道家的思想主张正好适应了这一需要。儒道两家的思想主张和价值取向，分别适应着人们在“穷”、“达”等不同境遇中的精神需要，因而唐明邦先生曾概括说：

“儒家以其长于经世务实精神而显扬于世,道家则以其玄虚旷达而为人钟爱。”道家引导人们放眼于广阔无垠的天地自然和历史长河之中,超越世俗的名利地位或一时一事的成败得失,“不为物累”、“安时处顺”,以“体道”、“悟道”为价值目标,这就有利于人们在更高的精神境界中实现心理平衡。

儒家强调对于封建等级制度的服从,并建构了一套封建伦理道德来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对于有思想、有情感、有意识的人来说,长期处于这种尊卑有等、唯上是从的氛围中,其受压抑、受束缚的痛苦程度是可想而知的。梁漱溟先生曾在其《中国文化要义》中抨击封建道德对人的压抑说:“到处弥漫着义务观念之中国,其个人几乎没有地位,此时个人失没于伦理之中,殆将永不被发现。……中国文化最大之偏失,就在个人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一个人简直没有站在自己立场上说话的机会,多少感情要求被压抑,被抹杀。”这种情感被压抑、被抹杀的状况长期延续,往往造成人性的扭曲、心理的变态,既不利于自身的身心健康,也可能造成对他人或社会的破坏行为。而道家反对封建等级制度对人性的束缚,反对封建的繁文缛礼,倡导无为而治,返朴归真,不阿权贵,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人们寻求精神上的自由,抚平心灵的创伤,减轻恶劣心境对自身或他人的损害。

儒家强调个体对于群体的服从,主张通过以个体融入群体的方式来保持群体的和谐统一,宣扬重义轻利,当个体的生命与道义相冲突时,则要求人们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按照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来分析,这种致力于现实社会秩序的安定和人际关系的和谐的价值取向已经超出了安全需要等较低层次的需要,而属于最高需要层次——自我实现这一层次的内容。此外,儒家的仁义忠孝等道德要求也都是建立在较高的需要层次上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上升到这种高层次需要并非轻而易举